

「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

楊正顯^{*}

康熙十七年，清廷開「博學鴻儒科」以修《明史》是震動當時遺民士子耳目的大事。過去研究多集中於此科士人間的交往與對清初學術的影響，較少關注明史館內館臣們對重要史實與人物的看法。本文透過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中側記館臣之言論，說明館臣們如何追論與議定「明亡之因」。首先談遺民們在「時忌」與生存壓力之下參與此科的景況。次談館臣對於「明亡流賊說」中楊嗣昌評價的爭議，說明當時吳偉業《綏寇記略》等等的負面評價，後因楊嗣昌子《孤兒籲天錄》之故，翻轉為正面的過程。再談晚明以來流行的「東林亡國」論，在館臣們爭論之中，轉以黃宗羲《汰存錄》為標準而偏袒東林，並以此評價晚明「三案」始末。最後討論「學術亡國」說。

館臣們爭論是否要依《宋史·道學傳》體例而立《明史·道學傳》，關鍵人物王陽明又是否應該進入〈道學傳〉中，但最終卻不顧陽明對於明朝學術實際的影響，而以「閑正距邪」標準，將陽明列入〈功臣傳〉中；後又因康熙帝的裁定，翻轉其評價。從對「明亡之因」追論與議定的過程來看，原本應該是透過清理史實，重建是非，以服人心之舉，卻仍然蹈襲晚明以來的「門戶之爭」，以致不合一代之公評，徒留黨人之餘習。但清廷開科修史的動作，成功地將天下士人耳目聚於明史館中，隨之而來的文字獄，更確立其對勝國史實的裁量權與發言權。

關鍵詞：博學鴻儒科 明史 三魚堂日記 忌諱 亡國

^{*} 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前言

朝代遞嬗是歷史的常態，但一朝之所以敗亡與一朝之所以興起，其間的因果關係，錯綜複雜，故始終是學界關注的課題。其中，關於「明亡清興」的探討，亦蔚為大觀。能證「明亡」之因，自能證「清興」之果，故追溯「明代何以亡」成為重要的切入點。學界大致從六方面來論說：亡於流賊、亡於宦官、亡於朋黨、亡於皇帝、亡於民窮與亡於學術。¹這六方面的問題，皆是集矢於晚明萬曆時期之後的史事。現今對明亡原因的追溯，多根據清人著作來立論，這其中包括為數上千的「明遺民」史學著作。²在清朝還未正式修《明史》之前，眾聲喧嘩，私家著作層出不窮，³導致對於單一史事卻有不同的見解，言人人殊。但自清朝於順治年間開始有修史的動作起，⁴亦代表在野的喧嘩之聲終將停歇，發言權逐漸歸於朝廷之上。一旦《明史》修成，所有有關勝國的種種，都將以此為根據。故《明史》的記載與說法不僅具有官方的權威性，亦是往後「明代」形象的「本事」。也因為如此，製造與編寫這些「本事」的明史館是如何運作？體例如何編寫？史事如何描述？討論的重點為何？等問題，都成為近代學者研究的焦點。⁵不論是明史館設立過程、明史編

¹ 徐凱，〈明朝大廈傾覆與社會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對明亡之因探討的再解析〉，《社會科學戰線》，11（2011），頁94。另可參考楊緒敏，〈明朝遺民私修明史與明亡歷史的總結——清初吳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與特點〉，《學習與探索》，5（2012），頁155-160。許克江，〈論明末清初私修史書對明亡歷史原因的探究〉，《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6（2009），頁24-26。清初計六奇的《明季北略》中，「論明季致亂之由」一條談明之所以失天下之故有四：外有強敵、內有大寇、天災流行與將相無人。而其「宋獻策與李岩議明朝取士之弊」一條中，宋獻策提出「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見〔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82-683、674。此條資料承編委會賜知，謹此致謝。

²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自序〉，頁5。

³ 闕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⁴ 朱端強，〈清順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論〉，《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5（2006），頁153-158。

⁵ 黃雲眉等著，《明史編纂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此書內所收文章針對《明史》編修過程有詳盡的說明。

寫體例之探討、⁶相關爭論議題的描述，乃至於後來《明史稿》版本的流傳與異同，都有學者戮力研究。⁷然對於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及修《明史》的過程，則是較少有學者觸及。⁸例如來自不同地域與背景的館臣們本身是如何看待《明史》的編撰？要如何議論與評價明朝滅亡的前因後果？對於明亡相關爭議又是抱持何種立場？種種問題由於清初的忌諱與時不時籠罩的文字獄氛圍，使得現今的學者很難從當時人，尤其是此科士人的文集中，清楚地理解這些爭議與其最終史實取捨的過程。但曾經被薦舉參與此科的陸隴其（字稼書，諡清獻，1630-1692）留存之日記，卻為我們開啟了一扇觀察當時史館內部爭論情況的窗口。

以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作為觀察史館之因有三：一是記錄時間落於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至康熙三十年十二月止，這一段時間恰好是修《明史》的第二個關鍵時期。⁹二是陸氏所交往的人多與館臣有關，例如總裁官張玉書（1642-1711）即是其鄉試時座師。三是陸氏本人極為注意史館內部的議論，因此《日記》中紀錄相當多這些相關的言論。本文主旨即是詳細地錄出日記中有關史館的言論，配合館臣士人文集的說法，以說明館臣們在編撰《明史》時思考什麼？忌諱什麼？相關爭議為何？議論過程與焦點轉移又是如何？但要說明的是，筆者只選擇陸隴其側記到館臣的言論，而不是以其主觀說法為切入點，以免有立場偏頗之虞。

⁶ 賴福順，〈清修《明史》體例之研究〉，《明史研究專刊》，7（1984），頁 51-88。

⁷ 《明史》現存稿本情形，請見衣若蘭所整理的表格，見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頁 45。黃愛平，〈《明史》稿本考略〉比對王鴻緒與萬斯同稿本異同，見《文獻》，18（1983），頁 93-108。同樣是比較，錢茂偉，〈《明史》萬稿與王稿類傳的異同〉則是談萬斯同稿的精神是繼承《史記》、《漢書》，而王鴻緒稿則是政治意味濃厚，繼承歷代正史寫作的作法，見《社會科學輯刊》，3（2013），頁 159-164。衣若蘭，〈舊題萬斯同 416 卷本《明史》〈列女傳〉研析〉則是討論北京圖書館藏 416 卷抄本內的《列女傳》，並與後來王鴻緒《明史稿》、通行本《明史》做比較，見《漢學研究》，28：1（2010），頁 263-293。

⁸ 賴玉芹，〈論博學鴻儒《明史》之獨特價值〉，《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33：4（2006），頁 482-485。孔定芳，〈論清聖祖的遺民策略——以「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江蘇社會科學》，1（2006），頁 206-212。

⁹ 李晉華，〈明史纂修考〉，收入黃雲眉等著，《明史編纂考》，頁 79-83。

一、開科修史

康熙十七年，清廷下詔開「博學鴻儒」科，以修《明史》。開科修史影響廣泛，當時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字蘧若）奏疏中云：

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雲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鬱葱綿亘，金碧輝映，乃故明逆璫魏忠賢之墓也。……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何以儆大憝、昭公法哉！況當奉旨纂修《明史》，凡明季被禍忠良諸臣，無不立傳。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妖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威，勅地方有司，仆碑剗墓。¹⁰

張瑗有詩紀此剗墓事，末兩句有云：

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臧。岩壑煎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于焉張。¹¹

從張瑗的角度來看，修史這事關乎於「善惡」、「是非」與「憲紀」，透過對史事判別，建立是非的標準，也就是立國之根本。為何張瑗藉剗墓一事突出修史為是非道德之伸張呢？是非道德的標準不早就見之於聖賢之書內嗎？張瑗做這事的動機，與明末清初以來是非淆亂的現實有關。明遺民呂留良（字用晦，號晚村，1629-1683）曾說：

京師失守，士大夫相率迎拜，旋轉取富貴，黨論互為塗飾。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廷，歸伏誅也，而曰「黨誣」。天下既亡，刑賞固無從問，而宇宙之是非，亦任其顛倒如是而莫之正。¹²

呂留良感觸於當時「無是非」的情況，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1610-1695）亦

¹⁰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卷4，〈口外異聞·魏忠賢〉，頁287。

¹¹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9，〈剗毀魏忠賢墓紀事詩〉，頁145-146。

¹² 〔清〕呂留良著，徐正點校，《呂晚村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卷7，〈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銘〉，頁165。

有同感：

鐘石變聲，誰不欲以清流自矢？靖節甲子，依齋易卦，年運而往，突兀不平之氣，已為飢火之所銷鑠。其聲之悲，唯恐人之弗聽也；其顏色之淒然者，唯恐人之弗矚也。落落寰宇，守其異時之面目者，復有幾人？¹³

清朝統治之初，是非倒置的現象，導致人心不穩、社會不安。所以在那山崩地裂的易代之際，是非價值無從建立，也無從遵循，士大夫輕名節之舉，怵目驚心。黃宗羲有詩云：

始知天地騫崩甚，還仗山村朴魯持。（劉伯繩[沔]言：「今日人心滅甚，天地所以不崩墮者，是山野中人牽補架漏耳！」）而我不容今世路，此情慚愧又何辭。¹⁴

「人心」已滅，惟存於遺民之上，黃氏說：

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¹⁵

但對於這些所謂遺老士大夫們，黃氏又分成三等：

余見今之亡國大夫大畧三等，或齷齪治生，或丐貸諸侯，或法乳濟洞，要皆胸中擾擾，不勝富貴利達之想。¹⁶

余觀今世之為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¹⁷

¹³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雜著稿》，收入《黃宗羲全集》，冊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壽徐掖青六十序〉，頁62。

¹⁴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曆》，收入《黃宗羲全集》，冊11，卷1，〈山居雜咏〉，頁235。

¹⁵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收入《黃宗羲全集》，冊10，〈碑誌類·謝時符先生墓誌銘〉，頁422-423。

¹⁶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壽序類·憲副鄭平子先生七十壽序〉，頁691。

¹⁷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碑誌類·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銘〉，頁341。

黃氏認為這些人因為仍存有富貴利達的想法，是科舉場屋的心胸，那能知道治亂存亡的故事。而「人心」的敗壞是從上到下的，《三魚堂日記》曾記曹溶（字秋岳，號倦圃，1613-1685）之語：

〔康熙十四年正月〕廿七。……午間晤曹秋岳。秋岳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於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平哉？」¹⁸

三藩之亂時，吳三桂（1612-1678）自稱「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討虜大將軍」，打著「反清復明」的口號興兵，亦有見於當時社會上「思明」之心不絕。康熙十四年，正是戰事激烈之時，但萬餘名腳夫不歸清而歸耿精忠（1644-1682），代表清朝還未真正得到當時百姓的信任。而清朝開科的目的是在籠絡士人之心，尤其是針對明遺民。孟森曾概括此科之開的原因云：

要於康熙朝所以安定人心之故，因此可以窺見。當時明社初屋，士雖有亡國之痛，而文會社集，仍沿明季故事。吳中名士，奔走甚盛，科舉之焰，深中於人心。四民以士為領導，士以科舉為依歸。其尤秀傑者，至科舉亦不樂就，而其才名已為士民指目，苟不得其輸心，則尋常科目，或有不足牢籠之人物，天下之耳目猶未歸於一也。聖祖康熙於三藩未平，大勢已不慮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動一世，巽詞優禮以求之，就範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強徹底之流，縱不俯受銜勒，其心固不以夷虜絕之矣。時天下名士推亭林、梨洲。梨洲雖不赴，猶遣子代應史館之聘。潔身事外者獨有亭林，要其著書立說，守先待後，亦無復讎視新朝之見矣。¹⁹

由於四民以士為領導，士人又以科舉為依歸，而尋常科目並不足以牢籠這些明（名）遺民，清廷遂希冀以此科將天下耳目歸於一處。誠如黃宗羲所說遺民裏仍有人懷抱著「科舉場屋之心胸」，亦有「不勝富貴利達之想」，而清廷

¹⁸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3，〈乙卯〉，頁480。又「盡歸於寇」之寇為三藩中的耿精忠，見〔清〕吳光西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乙卯十有四年三月條，頁33。曹溶曾經被薦舉參與博學鴻儒科，以疾辭。

¹⁹ 孟森，〈已未詞科錄外錄〉，收入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南天書局，1987），頁517。

朝此舉正中其懷。

康熙十七年，下詔開科，希望各地督撫「薦舉」，引起士大夫間沸沸揚揚的議論。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1634-1711）在給王弘撰（字文修，號太華山史，1622-1702）信中說：

頃徵聘之舉，四方名流，雲會輦下，蒲車玄薰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觀之，士風之卑，惟今日為甚。如孫樵所云：「走健僕，曩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者，蓋什而七、八。」其自重以重吾道、重朝廷者，廋有之矣。²⁰

士風之卑，說的是這些士人中十之七、八為求被薦舉，四處請託。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中也關注薦舉之事：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一，接吳準菴（源起）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予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²¹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十九，始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邱近夫（鍾仁）、潘次耕（耒）同在舉中，此可喜也。²²

〔康熙十七年四月〕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象樞）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又言「少詹王澤宏（字涓來）為予搢腕」。²³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七，葉訥菴（方藹）來會。……又言「薦舉中，湯名斌、施名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²⁴

從這四條時間相近的紀錄，不難看出陸氏顯然對於被薦舉一事心情上是歡喜的。他注意到有誰被薦舉，也提及被薦舉之人必須要能「文」，畢竟此科是要考詩賦，而非理學思想。不過，也有人不想被薦舉，如呂留良：

²⁰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5，〈外大吏〉，頁280-281。

²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02。

²²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03。

²³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11。

²⁴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6，頁534。

〔康熙十七年五月〕初三，會柯寓匏（崇樸，呂留良弟子），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東莊（呂留良）有書來，惟恐薦舉之及。」²⁵

就因為在這些被薦舉的一百八十餘人之中，²⁶龍蛇混雜，高者自有，但四處請託薦舉之人亦復不少。《日記》中記云：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九，柯翰周名維楨來會，言初七日見薦舉諸人會於眾春園，有以嫚詩緘封呈汪荅文（琬，號鈍翁，1624-1691）者，眾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藉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²⁷

所謂「嫚詩」即是帶有輕視與污辱之意的詩，而最後一句描述眾春園宴會之景況，諷刺這些被薦舉之人原似唐堯之時隱居不仕的巢父與許由，現在卻飲酒作樂於皇家之所。除了薦舉過程引人非議外，考試與評卷的評價，亦有閒話在。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1618-1683）在其家書中說：

試卷傳出，都下紛紛訛言，皆推我為第一名。久之，半月後方閱卷。我絕不送卷與內閣諸公。初亦暗取在上上卷，列三五名中，後因詩結句有「清彝」二字，嫌觸忌諱，竟不敢錄。得高陽（李蔚）相國爭之曰：「有卷如此，何忍以二字棄置？此不過言太平耳。倘奉查詰，吾當獨任之。」於是姑留在上上卷第十五名。又推敲停閣半月，則移在上卷第四。皆此二字作祟也。……上意本極隆重，今不收入翰林，概發史局修《明史》，是第一難題目。雖聞已下銓部議授職銜，冷淡可想。將恐勞而無功，不知作何下落？²⁸

²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11。

²⁶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搗謙嗣寅、江西魏禧冰叔、山西范鄙鼎彪西、陝西李顥中孚。」見〔清〕王士禛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談故四·徵聘不至〉，頁82-83。

²⁷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6，頁535。

²⁸ 〔清〕施閏章撰，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補遺一·試鴻博後家書十四通·二〉，頁124。余嘉錫，〈試鴻博後家書十四通跋〉：「第二書言試鴻博時，名次在甲科，以詩末句『清彝』字抑置二等。按：清初諱『夷狄』字，改寫為『彝敵』，然特出於臣下之揣摩，私相避忌，非功令也。故乾隆四十二年嘗因四庫館所進《宗澤集》將『夷狄』字改寫，降旨深斥之。先生康熙朝，而用『清彝』字，則疑於『清夷』之有意指斥，故閱卷諸人遂以為觸犯忌諱，此與明太祖之疑『作則』為『作賊』者何異！」收入〔清〕施閏章撰，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附錄二〉，頁270。

這前半段家書說的是評卷過程暗藏玄機，原本應該列在高等，卻因「清彝」二字嫌觸時忌，而有落卷之危險。不過，外間人認為施氏落置二等的原因是作詩時誤書韻字：

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進。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為「旂」，改置二等。²⁹

因為一字之誤，而被評置二等，恐難取信於人，真正原因恐是施氏所言。這家書後半段則談入科後，不入翰林院，直接派去修《明史》，也就是說原本並無官職授受的，與平時的制科不同。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1629-1709）曾回憶說：

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³⁰

吏部會議以資格區分，原已有官職的改以館職用，沒有的則要等《明史》修畢後才授官職。不過，千辛萬苦赴京趕考，考上卻無官可做，引來非議，施氏家書中有云：

銓部初議我輩候補者，俱原銜修史，毫無改授，通國為之不平。我輩株守無求，人品自見。今奉恩旨駁批，俱以翰林用矣。目今一議「講讀」，一議「編檢」，局尚未定，無錢人不得不靜聽位置。要之過望逾量矣。詞學安在，而猥以「宏博」名耶？³¹

因為有人抗議，故全部人皆以「翰林」任用，施氏對此則懷抱可有可無的心態。施氏最後一句或許是說「博學鴻儒」科不同於一般的制科，職位安排也應該有所不同才是，否則不用加之「宏（鴻）博」名。但外界顯然不這麼看，因為五十人全入翰林院的作法引來當時制科翰林的譏諷。陳康祺記云：

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外閒遂有「野

²⁹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頁89。

³⁰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76，〈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志銘〉，頁721。

³¹ [清]施閏章撰，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補遺一·試鴻博後家書十四通·五〉，頁126。

翰林」之目。此舉主司為寶坻杜文端、高陽李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癡獸被虎欺。宿構零駢璇玉賦，失拈落韻省耕詩。（試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按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為者，妬寵爭榮，甘為妾婦，於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³²

制科翰林譏諷這五十人不但學問不好，又想要官做，以此利祿之心來修《明史》，勝國君臣也皺眉。鈕琇（字玉樵，？-1704）談及傅山（字青主，1607-1684）時說：

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落拓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³³

除了自己本身的問題外，所謂「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說的正是當時兩科齟齬的情況。數年之後，此科之人還待在翰林院的，沒有幾個。

這五十個人先有「博學鴻儒」高名，繼有授官爭官之議，使得《明史》一開修，即面臨朝野上下很大的壓力。即以施閏章為例，先以「清彝」二字犯時忌，後被目為「野翰林」，如此氛圍下，欲要判別勝國史實真偽，評價功過得失，不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小慎微。《三魚堂日記》記說：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八，張（玉書）老師設酌，黃伯和、謝瞻在同席。張老師……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初奉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實錄》翻譯，呈看酌定，所以遂中寢至今。」³⁴

張玉書說的時間點應是順治時期修史之初，當時滿人要館臣們將《實錄》翻譯為滿文，「呈看酌定」，當然是要確認《明史》內是如何描述清朝之興與寇邊史實的。一方面表明滿人一直注意著《明史》的編撰，另一方面從總裁官

³²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鴻博主試之被嘲〉，頁366。

³³ [清]鈕琇，《觚賸·續編》（臺北：中興圖書出版社，1957），卷2，〈人觚·傅徵君〉，頁207-208。

³⁴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5，頁527。

張玉書說出此事，不啻說明當時修史的忌諱。³⁵開館之後，湯斌（字孔伯，號潛庵，1627-1687）寫給曾被薦舉博學鴻儒科的王弘撰信中說：

史事正德以前，稿已粗就，目下分世廟以後，大約明春初稿可成。……

後半漸入近事，封疆門戶忌諱繁多，尚求時賜指南，庶免隕越。³⁶

「封疆門戶忌諱繁多」一語，指的是清朝寇遼東與門戶黨爭，前面忌諱於清廷，後面忌諱於黨人後代。黨人之後的黃宗羲在送萬斯同（字季野，稱石園先生，1638-1702）與萬言（字貞一，號管村，1637-1705）兩人北上入史館的詩云：

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搜烈廟終。此世文章推婺女，定知忠義及韓通。憑君寄語書成日，糾謬須防在下風。³⁷

黃氏說到修史會遇到的問題是萬曆朝後的「是非不定」與崇禎朝無《實錄》可據的問題。另外，修史時一方面要強調秉持「忠義」的標準，另一方面以後周韓通（？-960）為例，亦應述及易代之際死事之人，免為後世所譏。³⁸朱彝尊則更進一步點出問題：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踏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³⁹

「稗官踏駁」是指各種野史間說法歧異，甚至觀點評價大相逕庭，這一點只要翻閱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即不難想見。可見當時朝野都知道修《明史》的困難在於如何處理萬曆朝後的政治發展，及在無《實錄》可據的情況下，如何編撰與評價「末代皇帝」的歷史。如此忌諱甚至產生將《明史》下限斷至萬曆的說法。⁴⁰朱彝尊在給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1634-1691）的信中說：

³⁵ 編《陸隴其年譜》的吳光酉就不錄此對話進《年譜》中。

³⁶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二集》，卷5，〈外大吏〉，頁280。

³⁷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曆》，卷2，〈送萬季野貞一北上〉，頁282。

³⁸ 韓通的典故承林勝彩博士告知，謹此致謝。

³⁹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卷32，〈史館上總裁第七書〉，頁393。

⁴⁰ 李治亭，〈明亡神宗辨〉，《史學集刊》，2（1998），頁26-31。何冠彪云：「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雖起源於康熙朝，但到乾隆朝才成為定論。……弘曆堅持『明亡於萬曆』及反覆論述明末的政治腐敗，實有助於印證清興的合理性。」參見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國立編譯館館刊》，28：1（1999），

昨過史局，同館諸君咸在。大興張編修（烈）忽倡議，謂《明史》當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其意以本朝太祖建元天命在萬曆三十六年故云。……為此說者殆巧于避禍之謀爾。是日同館之論，謂斷限宜請之天子。⁴¹

朱彝尊很清楚點出將明亡斷在萬曆朝是「避禍之謀」，因為這樣做就可以避開往後種種的忌諱。當日館臣結論是要請示天子裁斷。「明亡萬曆」的說法一直都有，曾參與修史的汪霏（字朝采）之子汪景祺（字無已，號星堂，1672-1726）記云：

且謂明亡於萬歷年，太祖龍飛而明社遂屋，萬歷中年以後皆刪之，《明史》至萬歷而止，一時爲之不平。相國（熊賜履）聞之，遂以詞臣所修《明史》付之烈焰。書上不當先帝意，留中不發，相國窘甚。⁴²

可見即使到了康熙晚年，還流傳此說，只不過不被皇帝所接受。

在內外忌諱繁多的情況下開館，隨之而來的是對於撰述《明史》種種工作的分配，而對於史實真偽的判別與歷史人物的功過評價，自然成為館臣間議論的焦點。而前述六個亡明之因，其中「亡於崇禎帝」之說，已被順治帝修史時所否定，⁴³往後館臣因此沒有再提。而在《日記》中，只談及亡於流賊、亡於朋黨與亡於學術三方面。

頁 271。

⁴¹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卷 10，〈史館上監修書〉，頁 1012。

⁴² [清]汪景祺，《西征隨筆》（臺北：新興書局，1976），〈熊文端明史〉，頁 4755。

⁴³ 《北遊集》記云：「上（順治帝）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併將來，約有八、九十幅。上一一親展眎，師（弘覺）時覺上容慘戚，默然不語。師觀畢，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羣工不得妄議崇禎帝。又命閣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豎於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由臣工，而崇禎帝非失道之君也。』師曰：『先帝何修？得我皇為異世知己哉！』」參見[清]釋道忞，《北遊集》（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卷 4，〈奏對別記下〉，頁 74-75。亦見[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初集》，卷 1，〈北遊集〉，頁 13。

二、「明亡於流賊」說

館臣潘耒（字次耕，又字稼堂，號止止居士，1646-1708）在《寇事編年》（即《懷陵流寇始終錄》）的序中說：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
邊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
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明亡於流寇，蹂躪遍天下，自起
至滅二十餘年，是恆有專書紀其始末。⁴⁴

二十餘年的流寇蔓延，無疑是晚明歷史發展的一大重點，後世史家以此為中心著史者不少。而吳旻（字修齡，1611-1695）在此書開篇〈流賊亡明節目〉中，確認了「明亡流賊」說。⁴⁵參與修史的毛奇齡（字大可，號西河，1623-1716）也說「明亡于流賊」。⁴⁶而清朝與明亡無關，反而是為明朝討賊的。⁴⁷明末清初士人何梨（字雍南，1620-1696）說：「皇清張大義，為勝國討賊，削平海內，敦厲風教。」⁴⁸可見在清初之時，「明亡」之因是不會與清朝興起與寇邊相關連的。由於流賊為明亡主因，詳盡描述流寇史實的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1609-1671）《綏寇紀略》，亦為時人所重。故當修史之際，此書被採集入史館之時，才理解到這書有版本異同問題。《三魚堂日記》記云：

〔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四，謁薦主文夏（席啟寓），言「《綏寇紀略》刻於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家有原本。⁴⁹

⁴⁴ 〔清〕潘耒，《遂初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6，〈寇事編年序〉，頁306。

⁴⁵ 〔明〕戴笠、吳旻撰，《懷陵流寇始終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頁11-23。

⁴⁶ 〔清〕毛奇齡，《西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82，〈叢蘭〉，頁23a。

⁴⁷ 因為「明亡流寇」，因此在《明史·列女傳》中有相當多的例子是列女不屈服流寇而死的貞節事蹟，見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頁319-355。此條承編委會賜知，謹此致謝。

⁴⁸ 〔清〕何梨，《晴江閣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26，〈碑記·睢州湯恭人祠堂碑〉，頁213。

⁴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11。

館臣朱彝尊說：

《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有旨勿論忌諱，盡上史館。于是先生足本（《綏寇紀略》）出。……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先生聞之於朝，雖不比見者之親切，終勝草野傳聞，庶幾可資國史之采擇者與。⁵⁰

當時此書版本有異，實因「忌諱」所致，故當朝廷下旨「忌諱勿論」後，足本才出。而所謂「綏寇之本末，言人人殊」，顯示綏寇史實在當時是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三魚堂日記》記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溶），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為二集，共有四千餘葉。……又言「梅村《綏寇紀畧》持論甚正大」。⁵¹

曹溶編撰崇禎朝史實，必定也參考了《綏寇紀略》，故做出了「持論甚正大」的評價。⁵²四庫館臣卻評價此書說：「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為公論。」⁵³楊嗣昌（字文弱，號字微，1588-1641）在明朝「綏寇」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綏寇紀略·開縣敗》一文裡描述楊嗣昌有云：

然十六年遣輔臣吳甡討賊，面諭以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以此知君臣之際，其相知為深也。十一日，召輔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不然。』」語畢，天顏慘惻久之。⁵⁴

⁵⁰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卷 44，〈跋三·跋《綏寇紀略》〉，頁 491。朱彝尊是〈流寇志〉編撰的負責人，因此會注意相關材料的收集。此條承張繼瑩博士賜知，謹此致謝。

⁵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 5，頁 545b。

⁵² 〔清〕趙翼，《簷曝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6，〈綏寇紀畧〉，頁 354：「《明史》孫傳庭、楊嗣昌、左良玉及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傳，大概多取之于吳梅村《綏寇紀畧》。蓋梅村於順治九年即輯成此書，而本朝修《明史》則在康熙十七年以後，時天下野史稗乘碑誌之類皆送史館，故《明史》於此數傳皆以《紀畧》為底本。」見〔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附錄〉，頁 512。

⁵³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卷 49，〈史部·紀事本末類〉，頁 1064。

⁵⁴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卷 7，〈開縣敗〉，頁 197。

皇帝認為自楊嗣昌後能督師討賊者，無人矣。吳偉業評論說：

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於辦賊，跡其議論奏疏，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誠不足，國事債而身亦從之。⁵⁵

但楊嗣昌終究因兵敗而自殺，夠格為「能臣」嗎？楊嗣昌歿後，評價兩極，顧炎武（字寧人，稱亭林先生，1613-1682）詩云：

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崢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遂，待誰更奮魯陽戈？⁵⁶ 武陵楊公子山松。

督師指的是楊嗣昌，其子楊山松（字長蒼，晚號忍古頭陀，1623-1687）已是僧人。兩世指的是楊嗣昌與其父楊鶴，顧氏認為楊嗣昌自殺之後，誰是能挽救時局之人呢？從詩意中，顯見顧氏是正面評價楊嗣昌的。但另一遺民黃宗羲在為徐開任（字季重）的《明名臣言行錄》（康熙二十年）序言卻說：

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捷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⁵⁷

黃宗羲就認為楊嗣昌是「喪師誤國」，而所謂的「《冬心詩》頌其功勞」指稱的是「易堂九子」中彭士望（字躬庵，號樹廬，1610-1683）的《冬心》詩二十七首。王弘撰曾論此組詩第六首云：

彭躬菴（士望）作冬心詩二十七首，刻木行世。其六章曰：「吾少從黨人，大言誅楚相。謂其忍奪情，虛功糜國餉。亂後逢闖徒，訪以當時狀。始悉武陵才，謀猷頗能壯。謂更一二載，賊軍盡摧喪。後復逢楚友，鄉評益公諒。謂獻挾往讐，取屍棄江漲。緋衣浮不沈，月餘還舊葬。自慚逐吠聲，發詞何褊宕。隆萬相江陵，國威甫遐暢。祇以峻狹故，萬口相排擋。吾黨三折肱，今更以身謗。」魏善伯（際端）語之曰：「公道極，尤妙在黃漳浦（道周）門人口中說出。」……大約

⁵⁵ [清] 吳偉業著，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卷7，〈開縣敗〉，頁199。

⁵⁶ [清] 顧炎武，《顧炎武全集·亭林詩文集·亭林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5，〈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其三〉，頁474-475。

⁵⁷ [清] 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序類·明名臣言行錄序〉，頁52-53。

武陵差賢於當時諸相，然封疆瓦裂，國社邱墟，而猶讚其謀猷之壯，
謬矣。夫不能奏實效於從前，而欲虛美其功於一二載之後，其可信乎？
至云「逢闖徒、逢楚友」，不知誰指？⁵⁸

彭士望在遇到「闖徒與楚友」後，對楊嗣昌的評價有了倒轉，並且將其比擬為隆萬時期的權相張居正（1525-1582）。同為「易堂九子」之一魏際端又說彭氏之語為「公道」之論，因為彭氏是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1585-1646）的弟子，且黃氏曾經彈劾楊嗣昌「奪情起復」之事。不過，王弘撰仍然與黃宗羲一樣，認為「封疆瓦裂，國社邱墟，而猶讚其謀猷之壯」的說法是錯的。最後，質疑彭士望所遇之人為何？然彭士望〈冬心〉全組詩並不是專為楊嗣昌申冤而做的，他在給友人信中說：

戊申（康熙七年），嘗為《冬心詩》三十首。……滅有明三百年社稷，
人咸歸罪闖獻，此何足責？「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赫赫有明，奄
寺滅之也。而奄寺之所以能滅國者，由於先皇之專任。先皇之所以專
任奄寺者，由於黨人之不忠，黨人之不忠，皆偽為之根柢也。此可為
痛哭流涕而繼之以血者也。⁵⁹

彭士望明白指出闖獻等流賊，並不是明亡的主因，而是偽道學之黨人。看過〈冬心〉詩的黃宗羲與王弘撰實際上是在迴避「明亡於誰」的問題，因為冬心詩第一首即云：

人才天地心，長養萬物命。學術蠱壞之，好惡失其正。舉世愛一同，
幻出千蹊徑。標榜各是非，傾危互機穽。遂令天失權，假人發真病。
盜賊九廟墟，將相三木鑿。方隅九萬里，雞犬不能靜。到今無悔慚，
耿耿勢彌盛。天亦且奈何，蓄怨不遑定。⁶⁰

也就是說彭士望將明亡歸因於「學術」，指的是以正學自居的東林。東林與亡國相關的問題，下文會論述。

⁵⁸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二集》，卷2，〈冬心詩〉，頁201-202。「冬心詩」收錄在[清]彭士望，《恥躬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1，頁258-263。第六首收錄在頁259。

⁵⁹ [清]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1，〈與方素北書〉，頁27-28。

⁶⁰ [清]彭士望，《恥躬堂詩鈔》，卷11，頁258。

館臣後來根據楊嗣昌兒子楊山松《孤兒籲天錄》的說法，對其採取寬容的評價。《三魚堂日記》記云：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二，萬名言字貞一來會。……萬云：「修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孤兒籲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道周）豈非乎？⁶¹

這段紀錄來自黃宗羲的學生萬言，特別顯得重要，因為其師並不認同楊嗣昌。而陸隴其則仍以「名教」標準，將楊嗣昌與黃道周二人对立起來。「是非」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道德標準」。值得說明的是楊山松此書乃有見於修史之故，而上之朝廷為其父申冤的，⁶²其著書之因就是在康熙十七年時目睹當時史書如《幸存錄》、《流寇志》、《國權》、《綏寇紀略》、《延綏志》諸書內容對其父的攻擊，他說：

以《幸存錄》言之，其宅心原主平恕，然所不知者自應闕疑，乃以不知同於所知者，一概逞臆而談，信口臧否，遂使後人因其人之高節而信其書之可傳，真偽不考，居然祖述。揆之作者，得毋神其恫乎？……至於《綏寇紀略》，云出吳梅村太史偉業之手。竊揣梅村當日身在史局，錚錚有聲，其是非自當不苟，且流寇一事奏疏邸報疑無有不留心者，較之彭（孫貽）談（遷）二君，迥乎不侔，何以不信目而信耳？亦取《流寇志》、《國權》諸書為據，且偏於影射之刺譏，傳會羅織焉！愛之生羽毛，憎之成瘡痍。其施之先人即不足恤，乃因先人而施及崇禎皇上，是豈當日身在事中者之所為也？⁶³

楊山松此書分成種種「之謗」、「之論」的標題，然後先記錄各種史書的看法，然後透過楊嗣昌奏疏書信的說法，一一反駁這些史書內對其父的毀謗，成功地為其父申冤，扭轉歷史的評價。

⁶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8，頁558。

⁶² 〔清〕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自敘〉，頁453云：「今者（康熙十九年冬至）聖天子在上，搜書修史，天語煌煌。博學宏詞，羣英濟濟。用是不揆孤陋，特輯此編以當采擇。」

⁶³ 〔清〕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1，頁475-477。

三、「東林亡國」說

朋黨門戶問題，從晚明「三案」起，與明朝國祚相始終，因此被視為亡國之因，也是相當流行的說法。明遺民張岱（字宗子，號陶庵，1597-1679）面對有人對其《石匱書》不擁戴東林之批評，反擊說：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風波水火，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朋黨之禍，與國家相為終始。……今乃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筆，仍欲擁戴東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⁶⁴

說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顯見張岱對當時東林人士的不滿。開科之初，就已經有人論及東林之事，日記記云：

〔康熙十七年九月〕十八，張（玉書）老師設酌，黃伯和、謝瞻在席。張老師……又言：「黃太冲《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⁶⁵

夏允彝（字彝仲）的《幸存錄》從「國運盛衰之始」、「遼事雜誌」、「門戶大略」到「流寇大略」與「東彝（夷）大略」，皆有觸及。但其中的關鍵點乃是將明亡歸因於東林。書中說到崇禎時的朝政：

周（延儒）再出，頗反溫（體仁）之所為，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在東林過激以至此，遂致天下左衽，痛哉！痛哉！當溫之秉政，台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為之有迹。⁶⁶

夏氏認為東林攻擊周、溫兩人是從門戶起見，不是從國家起見的。而黃宗羲

⁶⁴ 〔清〕張岱著，夏咸淳校點，《張岱詩文集·琅嬛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3，〈與李硯翁〉，頁232-233。

⁶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5，頁527-528。

⁶⁶ 〔明〕夏允彝，《明季稗史·幸存錄》（臺北：新興書局，1974），卷下，頁1095-1096。

不滿《幸存錄》的內容而做《汰存錄》，⁶⁷針對前述夏氏說法，他說：

溫體仁之苞苴，巧於納者也；周延儒不巧於納者也。觀其後之富，豈不納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進小人、退君子為事，何可悉數？……愚嘗言有明之亡，方、沈、溫、蔡，湖州之力也。觀年來湖州史禍，抑所謂天之報施者非耶？⁶⁸

黃宗羲的反擊非常兇狠，他不直接回應東林亡國論，而從具體事實論起。他認為從溫體仁身後之富情況即知其收取賄賂，並且認為其專以「進小人、退君子為事」，最後還認為明朝滅亡，湖州人出最多力，所以後來報應在莊廷鑑「明史案」上。從這兩條文字論說，即可知雙方皆以門戶立說，黃宗羲甚至提出報應之說，無怪乎張玉書認為其說法過於嚴厲。這個說法與曹溶相去不多，日記記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溶）。……又言：「夏彝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⁶⁹

從陸氏的記載來看，擁護東林者會相信黃宗羲之言，反之則信夏允彝。但誠如筆者一開始所引張岱之言，東林究竟要不要為亡國負責呢？這仍然是一個很難判斷的因果。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1631-1694）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接任《明史》總裁官，隨後制訂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規範《明史》的寫作原則。其中兩條與此相關，初步論斷東林的功過：

（45）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速請移宮，防變慮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為功，何得指以為罪，乃竟以是案寘諸君子於死地，孰是孰非？何煩置喙。儻執羣小之言，謂為衆正之過，

⁶⁷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汰存錄》，〈題辭〉，頁330：「余近見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於夏彝仲允彝《幸存錄》。彝仲難死，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其師齊人張延登（字濟美，號華東）？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為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彝仲人品將存千秋，並存此錄，則其為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存錄』可也。晚進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愛彝仲耳。」

⁶⁸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汰存錄》，頁338。

⁶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7，頁545。

人心已滅，史筆豈宜。

(46)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弑之心，亦當伏妄投之罪。稽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醫皆繫獄論死，彼豈有弑逆之謀，國典當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罪，實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子抗疏力爭，自不可少，而乃翻以爲罪，奚以服人？事有公評，毋徇邪說。⁷⁰

這兩條條議的立場完全站在「君子（東林）」的一方，甚至還說「謂爲衆正之過，人心已滅，史筆豈宜」，又說「事有公評，毋徇邪說。」不過，館臣張烈（字武承，號孜堂，1622-1685）提出不同的意見，毛奇齡因此與其論辨，他記云：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爲爭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至尊論定之。」⁷¹

張烈的三劄應是其〈讀史質疑一〉、〈讀史質疑四〉與〈讀史質疑五〉，其中〈讀史質疑五〉即是「東林非君子」之說。張烈說：

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號爲「君子」者，喜事好爭，不復知有惻怛平情之論。……以保護元子爲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己名利之計，此忮心所發耳，非忠臣所爲也。況踵事深文，因之爲門戶，甯喪國而不悔。爲小人者，無足怪矣。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遠，前人之夢已斷，而尚論者欲代爲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⁷²

張烈認為這些所謂爭「國本（萬曆帝立儲）」的「君子」們，只為自己有无忠臣之名，不顧君臣父子之義，門戶之爭起，最終導致亡國。最後一句不僅追責於過去，也暗諷此時擁護東林之人是在「續夢」嗎？是要將晚明朋黨之爭延續至今嗎？這個評價引起很大的非議，毛奇齡說：

時崑山徐司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兩衙門當羣起

⁷⁰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14，〈脩史條議六十一條〉，頁41。

⁷¹ [清]毛奇齡，《王文成傳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卷2，頁19-20。

⁷² [清]張烈，《王學質疑》（臺北：廣文書局，1982），〈附錄·讀史質疑五〉，頁15-16。

攻之矣！」總裁令屏〈劄〉并書焚之。⁷³

但不僅張烈有「東林非君子」之說，還有「東林黨」之說。監修徐元文座師、也是館臣尤侗（字同人，號悔庵，1618-1704）的《擬明史樂府》中有〈東林黨〉一詩云：

漢君宗，唐牛李。洛朔蜀，皆君子。朋黨論，東林起。宦官傳，相終始。東林講學固迂儒，東廠要典豈聖書。錦衣衛中殺直士，國子監傍祀刑餘。椒山已入張經獄，楊左還隨廷弼族。朝署方將門戶爭，市曹自爲封疆戮。

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時目爲東林黨，沈一貫爲浙黨，門戶傾軋垂五十年。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旁，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許之。嚴嵩殺楊繼盛，以其名竄入張經失機律；楊漣、左光斗坐受熊廷弼賄，擬罪追贓，實風馬牛不相及也。⁷⁴

尤侗視東林爲「朋黨」，導致朝有「門戶爭」，野爲「封疆戮」。遠在浙江的黃宗羲亦聽聞史館內之爭論，其詩有云：

近觀何人言，衣飾古瘡痍。槩以黨一字，削平無賢奸。夫苟持異說，直可譽京韓（蔡京、韓侂胄）。亦有賢子孫，見之摧心肝。但可以哀情，稍爲祖父寬。紹述仇君子，無異斲親棺。⁷⁵

所謂「槩以黨一字，削平無賢奸」，指的是以「黨」論東林；而「紹述仇君子」，是指張烈「東林非君子」之說。朱彝尊目擊館臣諸公種種言論，上書給總裁官云：

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

⁷³ [清]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卷2，頁19。

⁷⁴ [清]尤侗，《西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擬明史樂府〉，頁541。尤侗說：「予三載史局，纂列朝諸臣傳、外國傳共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因措其事可被借鑑者，《擬明史樂府》。」見[清]尤侗編，《悔庵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卷下，頁64。

⁷⁵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曆》，卷4，〈腳氣詩十首·八〉，頁337。

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⁷⁶

朱氏認為作史者不能存「門戶」之見以「黨同伐異」。而所謂「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一語，不正意指像夏允彝之類的人嗎？⁷⁷但不管攻擊或擁護東林者，皆是「執門戶以論人」，造成「是非不公」的結果，人心不服。

不過與〈條議〉的態度一般，修史立場傾向東林。《日記》記云：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廿五，又會黃俞邵（虞稷，號楮園，1629-1691）。……

又言「今史館言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爲主。」⁷⁸

這距離〈條議〉的公布，已過一年了，可見對東林功過的爭議，持續一年。

四、學術亡國說

清初以來，對於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子，1472-1529）的功過評價，就屢屢爲士人所注目，王弘撰在論《明實錄》的記載時曾說：

嗚呼！以方正學之殉節而修《實錄》者誣之以叩頭乞生，楊文貞（士奇）可謂無天理矣。以王文成之伐叛而作國史者誣之首鼠兩端，費文憲（宏）尚可謂之有人心乎？近日孫少宰（承澤）著書，略文成之善而獨言其通濠有因，則以論學之不合而偏於作惡，欲從百年後定百年前莫須有之案，亦異矣。少宰博學好古，予素重之，惟於此不能無憾也。⁷⁹

王弘撰特地提到孫承澤（字耳伯，號退谷，1592-1676）的說法，是有其背景的。康熙四年欲修《明史》，但缺崇禎朝《實錄》，康熙七年孫氏即輯成《山書》

⁷⁶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卷 32，〈史館上總裁第六書〉，頁 392。

⁷⁷ 關於夏允彝與夏完淳（1631-1647）父子殉節之事，請見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頁 263-307。

⁷⁸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 8，頁 557。

⁷⁹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初集》，卷 5，〈王文成〉，頁 118。

代替之。孫氏還有相當多的史學著作，故王弘撰稱其「博學好古」，唯一不同意孫氏的地方是對「王陽明」的評價。⁸⁰孫承澤《考正晚年定論》批駁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論點，在其他的著作裡提及陽明之處，也都是批評之語。而孫氏與當時北京的學人，都有交往，《日記》記云：

〔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四，孫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論》等書。⁸¹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初四。……陸翼王（原輔）來會於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⁸²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初一。赴蘇眉生（原空）酌，翼王在坐。……又言：「魏環極（象樞）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⁸³

連朱彝尊跟顧炎武都曾在其門下，「相助校對」，可見孫氏書的影響力。而王弘撰所指稱的說法應是孫氏著作於康熙十年的《天府廣記》。其中論及陽明從祀一節，先談隆慶五年廷議陽明從祀的過程，繼而錄申時行（1535-1614）之說，最後以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之說結論。徐學謨在述完廷議、嘉靖帝的裁示之後，下了一個案語云：

據廷議執論頗公，即守仁復生，亦難逃責。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泯，第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餘緒，以誘惑愚誕也。旨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公律哉？頃躋從祀，當事者寧忘皇祖之訓？疑所謂虛聲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為熙寧調停耳。或曰：出自內旨，閣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⁸⁴

⁸⁰ 「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秘翫咸歸焉。……凡予所談論，退谷輒喜，以為與己合。唯於王文成有已甚之詞，予不然之。」見〔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初集》，卷1，〈孫少宰〉，頁21-22。

⁸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3，頁490。

⁸²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3，頁494。

⁸³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3，頁496。

⁸⁴ 〔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卷9，〈文廟〉，頁

所以王弘撰才說孫氏是以自身學術立場出發，「欲從百年後定百年前莫須有之案」。

開科之初，亦有不少理學家進入薦舉之列，如之前曾引的呂留良與陸隴其等，雖說後來未能入科，但史館內仍然有理學之分野。《日記》記云：

〔康熙十七年五月〕初二，候張夫子（玉書），字素臣（存），拳拳有意於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為非。⁸⁵

而另一總裁官葉方藹（字子吉，號訢菴，1629-1682）則偏向陽明。《日記》記云：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十。會葉訢菴。適陸翼王同在座。……（訢菴）又稱陽明之人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訢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於禪」，訢菴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訢菴論學微主陽明，予因初交，未敢深言，尚有待也。⁸⁶

當然理學家不同於史學家與文學家，對於「學術」的異同特別在意，館臣沈珩（字昭子，號耿岩，1619-1695）就是個典型例子。其傳有云：

其學以窮經研理為務。……欲學者於日用事務間，求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論交當世，同人有辨及異同者，珩瞿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是非。」聞者縮舌。⁸⁷

「當論邪正，不當論是非」出自史官之口，即可想見史實是非對其不是最緊要的事，而是「學術邪正」。《明史》應該記錄的是當日的史實呢？還是擇取所謂「正學」人物記之呢？這個問題顯現在〈王守仁傳〉該歸入何傳？開館之初，館臣曾就《明史》是否應該沿襲《宋史》的體例，設置〈道學〉、〈儒林〉二傳，有過討論。館臣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1631-1700）在奏疏中說：

自今纂修《明史》，合無照《宋史》例，將明儒學術醇正與程朱脗合

99。此段文字見〔明〕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5，頁521。「通濠有因」或指《世廟識餘錄》，卷1，頁490。孫氏此書著作時間，見〈出版說明〉，頁3。

⁸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511。

⁸⁶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6，頁535-536。

⁸⁷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64），卷70，〈文苑傳·沈珩〉，頁52-53。

者，編爲〈道學傳〉，其他有功傳註及學未大醞者，仍入之〈儒林傳〉中，則大道不致混淆而聖謨獨高於今古矣。⁸⁸

也就是說〈道學傳〉只收學術合於程朱學的學者，其餘劃歸〈儒林傳〉。館臣湯斌在〈明史凡例議〉中提及〈道學傳〉設立與否的問題，爭論的焦點是陽明該不該列入？他說：

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為一卷；王文成、鄒東廓、錢緒山、羅念菴等為一卷；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劉念臺等為一卷。〈道學傳〉不任用多人，諸公以「道學」為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如不立〈道學傳〉，止稱〈儒林傳〉，則薛以相臣，王以勲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谿、羅近谿諸公可得一二十人，與注經釋傳者先後竝列焉。……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⁸⁹

湯斌的意見是如以「道學」為重，入傳之人則區分為程朱、王學與東林三派；但如不以道學為考量，則將薛瑄入〈相臣傳〉，陽明入〈勲臣傳〉，其餘諸人皆歸〈儒林傳〉。而湯斌此話末句，則意有所指，刻意分別「修史」與「專家著述」的不同，顯然是要提醒館臣諸公，現在是「修《明史》」，需合一代之公評，不應以個人好惡來修史，誠如孫承澤一般。

康熙二十年四月，館臣張烈作《王學質疑》，批駁陽明《傳習錄》之說；且進三〈劄〉，中有「陽明非道學」的說法，分別是〈讀史質疑三〉與〈讀史質疑四〉。〈讀史質疑三〉要點有二：一是明朝沒人夠格堪立〈道學傳〉，故不須立；二是將「辱聖門甚焉」的陽明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學者，必以史臣為無識矣」。⁹⁰〈讀史質疑四〉說法的要點有四：一是陽明

⁸⁸ [清]彭孫通，〈明史立道學忠義二傳奏〉，收入[清]劉承幹，《明史例案》（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9，頁644。

⁸⁹ [清]湯斌，《潛庵先生擬明史稿》（成都：巴蜀書社，1993），〈明史凡例議〉，頁3。

⁹⁰ [清]張烈，《王學質疑》，〈附錄·讀史質疑三〉，頁10-11。

應列在〈功臣傳〉、二是認定陽明不是程朱正統、三是陽明倡導「無善無惡之說」，其學說是禪學、四是陽明之學導致亡國。⁹¹由於張烈不贊成設立〈道學傳〉，故將陽明放進〈功臣傳〉中，接著歷數其學不合程朱、導致無善無惡說之流弊，後竟致亡國的說法。張烈不是第一個主張「王學亡國論」的人，呂留良就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為佳而倣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⁹²

陸隴其也認同這樣的說法，他說：

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⁹³

因此，人心壞，勝國亡，皆由陽明學術之故。而〈修史條議〉裡四條有關於學術立傳的條議：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弘以後，指歸各別，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於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傳〉。……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其餘總歸〈儒林〉。

陽明生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王龍谿畿輩皆信心自得，不加

⁹¹ [清]張烈，《王學質疑》，〈附錄·讀史質疑四〉，頁11-14。

⁹² [清]呂留良，《呂留良詩文集·呂晚村先生文集》，卷1，〈答張菊人書〉，頁30-31。直至清中葉，程朱學者唐鑑，《唐確慎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卷1，〈學案提要〉，頁21，仍說：「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是以『天泉』一會，為陽明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淪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

⁹³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雜著·學術辨上〉，頁336。

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艮隱怪尤甚，並不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為切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為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為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谿、周海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寢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⁹⁴

第一條內容與彭孫遹的主張相同。第二條則與湯斌和張烈之說相同，將陽明列入〈名卿列傳〉（〈功臣傳〉），而白沙、湛若水與陽明弟子等則入〈儒林傳〉。三、四條則補充說明陽明浙東弟子提倡無善無惡之說，連立傳都不必。四條議公布後引來朝野間紛紛之議。毛奇齡（康熙二十六年後家居）憶說：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爭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監修公暨史館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立〈道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隸〈勲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學」之名則從此削去，為之一快。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啟奏，賴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也。」于是衆論始定。即史官尤侗作〈陽明傳〉，其後史斷亦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特聖學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⁹⁵

毛氏所謂「道學異學」之說，是指宋代的「道學」無實用，而陽明卻是「有用道學」，⁹⁶並以此說改變徐乾學立〈道學傳〉的作法。在野的黃宗羲也認為是他寫了〈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⁹⁷後所致的結果。他說：

⁹⁴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14，〈脩史條議六十一條〉，頁41。

⁹⁵ [清]毛奇齡，《西河集》，卷122，〈辨聖學非道學文〉，頁322。

⁹⁶ [清]毛奇齡：「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學』一語，真聖人之言。宋學為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為「聖學」，輕事功之言。……何況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知聖學者，烏能言之。」見《王文成傳本》，卷2，頁19。

⁹⁷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頁219-223。對黃宗羲此書內容的討論已多，此處不贅述。簡要說明論爭過程及要點，

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⁹⁸

去掉「道學」二字，取而代之「理學」，仍然遭到黃宗羲的反對，關鍵點仍在於該如何評價陽明的學術與事功？假如陽明學合於程朱學，是否可列入〈理學傳〉呢？但條議中已將其放在〈功臣傳〉，間接否定其學不合於程朱學，但尤侗傳末卻說：

（陽明）自謂質諸千聖皆同，間於朱子未合。後序《晚年定論》曰：「既自幸其說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可以知其學之所造已。⁹⁹

既「其說不謬於朱子」，不正可列入〈理學傳〉中？而毛奇齡認為尤侗之傳沒有指出康熙帝所說陽明學「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之「聖學」究竟何在？尤侗原文是：

夫子言「共學」、「適道」而進之于「權」，非權不足以濟其學也。若新建用兵多出權術，而擒濠之功，尤以反間得之。譖者遂謂其先交通而後歸正，蓋行權之難若此。至其良知之學，直揭本原，而詆譏邪說，至今未已。嗟乎！天下有可與權者而未可與學道乎哉？¹⁰⁰

尤侗的意思是以權得之事功必有其學其道，哪裡會有「有事功卻無學無道」的事？兩人認為有「事功」必有其「學」，都源自「內聖外王」的概念，但不同處在於毛氏認為宋代的「道學」並不是孔孟「聖學」。

尤侗之傳文是其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離開北京之前所作的，¹⁰¹但此年對陽明的評價開始有了翻轉，主因是毛氏所說得到康熙帝的認可。王士禎記云：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警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藹）時為總裁，予與

可見吳海蘭，〈試析清初《明史·理學傳》的論爭〉，《南開學報（哲社版）》，4（2011），頁 89-99。

⁹⁸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餘姚縣重修儒學記〉，頁 134。

⁹⁹ [清]尤侗，《明史擬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1，〈列傳·王守仁〉，頁 333。書前有康熙三十年識語。

¹⁰⁰ [清]尤侗，《明史擬稿》，卷 1，〈列傳·王守仁〉，頁 333。

¹⁰¹ [清]尤侗編，《悔菴年譜》，卷下，頁 65。

之辯論，反覆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荆峴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¹⁰²

文中說「秉筆者訾謗太甚」一語，指的就是張烈，因為開館之初被分配寫〈王守仁〉傳。¹⁰³到了康熙二十二年，因湯斌的說法受到皇帝的肯認，也就是正面評價王守仁。按照康熙帝「朕意亦如此」的說法，陽明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那麼列入〈理學傳〉，殆無疑義。但也就因為康熙帝的一句話，對陽明學術評價的爭論，又回到原點。此後，史館內對陽明的評價仍然爭議不斷，《日記》中記說：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廿八，往會湯潛庵。……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為姚江而發。¹⁰⁴

湯斌師承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世稱夏峰先生，1585-1675），理學傾向偏向王學，「今學者」或指張烈。而陸隴其說湯斌「大抵為姚江而發」，意指其迴護王學。《日記》又記說：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名開泰三人同素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為不是，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闢之也易。」¹⁰⁵

今日「闢陽明學」在張烈看來是較為容易的。再過一個月，《日記》記云：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廿八，赴徐名潮（青來）席。徐勝力（嘉炎）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為過當。又述湯潛庵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甯王，不知甯王一日未反，則尚是親王，以親

¹⁰² 〔清〕王士禛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卷9，〈談獻五·王文成〉，頁201-202。

¹⁰³ 〔清〕陸隴其，〈王學質疑後序〉，收入〔清〕張烈，《王學質疑》，頁1：「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

¹⁰⁴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8，頁558。

¹⁰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8，頁559。

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為冒。」……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力，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¹⁰⁶

館臣徐嘉炎（字勝力，號華隱，1631-1703）亦認為關陽明之學是錯的，主人徐潮亦主陽明。而在這個宴席上，提到熊賜履（字敬修，號素九，1635-1709）〈寄史館諸公書〉則是很重要的紀錄。此信是熊賜履給當時的監修官徐乾學，書中長篇累牘地批評陽明之學，最後說到：

今足下（徐乾學）既以斯文為己任，而又有素老（張玉書）諸君子同志商榷，幾希一脈，將從此大振。吾道干城，安得不推足下。然閑正距邪，千秋重任，幸益勉力擔荷，毋自諉，亦毋自矜也。¹⁰⁷

熊賜履此時因案家居，正努力編撰衛道之書《學統》，批評陽明並不奇怪。在此信中，熊氏要史館諸公做程朱學之「干城」，擔下「閑正距邪」之重任。無怪乎徐嘉炎認為熊氏此言太過，因為辨別學術異同是「教者」之事，也就是信仰程朱學之人才會這麼做，然這並非是館臣（學者）的事。這說法與湯斌雷同，都指出館臣不應帶有個人立場與意見來修史。當然，陸隴其是站在衛道的立場來駁斥這樣的說法。而湯斌反駁陽明通濠的說法，正與尤侗論斷中「譖者」所言雷同，可見即使有皇帝的說法為據，但館臣間還未有定論。如何平衡皇帝與館臣間意見的不同，實為身為監修官與總裁官的頭痛問題。這可從康熙二十八年時，徐乾學還寫信問陸隴其有關《明史·道學傳》的設立問題得到證實。康熙帝既已認可陽明學術不與朱子異，且又「直節豐功」，進入〈道學傳〉也是應然。陸隴其回信說：

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

¹⁰⁶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8，頁561。

¹⁰⁷ [清]熊賜履，《經義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0，〈論學書·復徐健菴〉，頁176。

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¹⁰⁸

陸隴其意思是〈道學傳〉專屬《宋史》，以表周程張朱等「作者」，而《明史》只能立〈儒林傳〉，以示為「述者」，也批評陽明以「作者自居」的作法。

結論

本文透過《三魚堂日記》內的諸多記載，觀察自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儒科以修《明史》的過程，說明館臣們所受到的內外壓力為何？以及往後因為個人意見使然，致使在追溯明亡之因時，對於史料的解讀與選擇，產生對立的情勢。日記中，對於「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集中於「流賊」、「東林」與「學術」三方面。為了避開清朝寇遼東之史實，張大流賊對於明亡的重要性，因此楊嗣昌的功過成為焦點。吳偉業的說法雖得到館臣內較多的支持，反之，明遺民黃宗羲與王弘撰則不以為然。但楊嗣昌評價之所以平反，還是得力於其子之書。張岱與夏允彝的「東林亡國」論，得到館臣張烈的強烈支持，但卻不為當時同館諸公所認同，以黃宗羲《汰存錄》駁《幸存錄》。但持平來說，黃宗羲之說也不免黨人之習。誠如朱彝尊說的「為國殉難，終以為偽」，這樣的評價在後世看來，為人臣者，誰還要堅持君臣大義呢？王陽明的功過卻是一棘手問題，如《明史》按《宋史》體例立〈道學傳〉，其既已從祀孔廟，不列進去，似乎說不過去。但如真列陽明於〈理學傳〉中，那麼他的弟子是不是也如同周張程朱師承授受般，皆入此傳呢？況且，要如何安排明代程朱學者的位置？加之當時「王學亡國」的時代氛圍，更使得這個問題更加複雜。而康熙帝的肯認，倒轉了陽明評價，看似有了定論，實際上卻使得館臣的論爭回到原點。或許釜底抽薪之計，誠如黃宗羲所建議的去掉〈理學傳〉之設，「一切總歸〈儒林〉」。¹⁰⁹館臣們的紛紛論議，莫衷一是，致使總裁官葉方藹也不得上書皇帝，他說：

¹⁰⁸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5，〈答徐健菴先生書〉，頁380-381。

¹⁰⁹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5）。

今纂修官約計六十餘員，家異師，人異學，保無傳聞之各別，意見之不齊者乎。臣等學術既陋，素望又輕，欲令折衷羣言，會歸一是，以肩最鉅最難之責，此所爲中夜徬徨踟躕靡措者也。……念《明史》一書所關甚大，臣等忻遇聖明，不自揣量，仰祈時沛綸音，一加申誡，則在事諸臣人人各思職掌，儼如天威咫尺，臨之在上，孰敢不化偏畸之私，共歸大公之理。¹¹⁰

葉氏說的保守，其實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不同的見解與堅持，仍然是「門戶」之見使然，期望透過皇帝的乾綱獨斷，使《明史》的編撰能夠順利進行。所謂「化偏畸之私，共歸大公之理」，正是切中館臣論議對立的關鍵點。或許這正是清朝政府想要的結果，所有對明朝史實與評價的裁量權，統統抓在手上，以是是非非。而過去清廷對在野的喧嘩之聲無能管控，但開科修史的動作，逐漸聲歸於上。天下士人尤其是明遺民耗盡心力於勝國史之撰寫與議論，何有與清廷一搏之力！

本文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收稿；2016 年 6 月 17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何幸真

本文曾經在「近世儒學與家族工作坊」相關會議上發表，承呂妙芬教授、張藝曦教授、林勝彩博士與眾學友多所指正，謹此致謝。又曾發表於「201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承鍾彩鈞教授評論與指正，謹此致謝。也謝謝兩位審查人的指正。

¹¹⁰ [清]葉方藹，〈史書關係重大懇祈天語申誠疏〉，收入[清]劉承幹，《明史例案》，卷9，頁642-643。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夏允彝，《幸存錄》，收入《明季稗史》，臺北：新興書局，1974，據同治壬申年（1872）刻本影印。
- 〔明〕徐學謨，《世廟識餘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4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徐兆稷活字印本影印。
- 〔明〕戴笠、吳旻撰，《懷陵流寇始終錄》，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冊 2，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
- 〔清〕尤侗，《西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影印。
- 〔清〕尤侗，《明史擬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5，冊 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尤侗編，《悔菴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7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毛奇齡，《王文成傳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87，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影印。
- 〔清〕毛奇齡，《西河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集 11，冊 178-18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
- 〔清〕王士禎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呂留良著，徐正點校，《呂晚村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清〕朱彝尊著，王利民等校點，《曝書亭全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清〕何昉，《晴江閣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7，冊 3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刻增修本影印。
- 〔清〕吳光西等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陸隴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12，冊 8，臺北：新興書局，1976。
- 〔清〕施閏章撰，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據清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本影印。
-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唐鑑，《唐確慎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 〔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43，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冠山堂刻本影印。
- 〔清〕張岱著，夏咸淳校點，《琅嬛文集》，收入《張岱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清〕張烈，《王學質疑》，臺北：廣文書局，1982。
- 〔清〕陳康祺著，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四十年（1701）琴川書屋刻本影印。
-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5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同治九年（1870）浙江書局刻本影印。
- 〔清〕彭士望，《恥躬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影印。
- 〔清〕湯斌，《潛庵先生擬明史稿》，收入《中國野史集成》，冊 22，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湯子遺書影印。
- 〔清〕鈕琇，《觚賸·續編》，臺北：中興圖書出版社，1957。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文集》，收入《黃宗羲全集》，冊 10，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詩曆》，收入《黃宗羲全集》，冊 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南雷雜著稿》，收入《黃宗羲全集》，冊 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清〕楊山松，《孤兒籲天錄》，收入《明雜史十六種》，冊 10，北京：中華書局，2013，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熊賜履，《經義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影印。
- 〔清〕趙翼，《簞曝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1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湛貽堂刻本影印。

- 〔清〕劉承幹，《明史例案》，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5，冊 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民國四年（1915）劉氏嘉業堂刻本影印。
- 〔清〕潘耒，《遂初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釋道忞，《北遊集》，收入《禪門逸書續編》，冊 10，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
- 〔清〕顧炎武，《亭林詩文集·亭林詩集》，收入《顧炎武全集》，冊 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 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629-16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十八年（1929）退耕堂刻本影印。
-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4。

二、近人論著

- 孔定芳，〈論清聖祖的遺民策略——以「博學鴻儒科」為考察中心〉，《江蘇社會科學》，1（2006），頁 206-212。
- 朱端強，〈清順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論〉，《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5（2006），頁 153-158。
- 衣若蘭，〈舊題萬斯同 416 卷本《明史》〈列女傳〉研析〉，《漢學研究》，28：1（2010），頁 263-293。
-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國立編譯館館刊》，28：1（1999），頁 271。
- 吳海蘭，〈試析清初《明史·理學傳》的論爭〉，《南開學報（哲社版）》，4（2011），頁 89-99。
- 李治亭，〈明亡神宗辨〉，《史學集刊》，2（1998），頁 26-31。
-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南天書局，1987。
- 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頁 263-307。
- 徐凱，〈明朝大廈傾覆與社會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對明亡之因探討的再解析〉，《社會科學戰線》，11（2011），頁 93-102。
- 許克江，〈論明末清初私修史書對明亡歷史原因的探究〉，《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社

科版)》，6(2009)，頁 24-26。

黃雲眉等著，《明史編纂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黃愛平，〈《明史》稿本考略〉，《文獻》，18(1983)，頁 93-108。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5。

楊緒敏，〈明朝遺民私修明史與明亡歷史的總結——清初吳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與特點〉，《學習與探索》，5(2012)，頁 155-160。

賴玉芹，〈論博學鴻儒《明史》之獨特價值〉，《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33：4(2006)，頁 482-485。

賴福順，〈清修《明史》體例之研究〉，《明史研究專刊》，7(1984)，頁 51-88。

錢茂偉，〈《明史》萬稿與王稿類傳的異同〉，《社會科學輯刊》，3(2013)，頁 159-164。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闕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The Debate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Yang, Cheng-hsien *

In 1678, the Qing court's inauguration of the “Erudite Scholasticus Recruitment Examination” for the collation of the *Ming History* was a great event that stirred the community of those who had lived through the dynastic transition.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se examination schola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arly Qing scholarship.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erspectives of officials in the Ming History Bureau o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rsonal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Lu Longqi's *Diary of the Hall of Three Fish*, which records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bureau officials' discussions to explain how they debated and determined “the causes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how censorship and pressure to make a living led those who survived the trans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xamination. It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theory of marauders causing the fall of the Ming” and the negative assessments of Yang Sichang in Wu Weiye's *General Record of Piracy* and other sources. The *Record of an Orphan's Plea to Heaven*, which portrays Yang Sichang in a positive light because it was written by his son,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The article then examines the popular late Ming argument that “the Donglin Movement destroyed the dynasty.” In their debate, the History Bureau officials took Huang Zongxi's *Record of Discarding and Preserving* as a standard and sided with the Donglin partisans. They also gave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the Three Cases” in the late Ming.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notion about “[false] learning destroying the dynasty.”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Teach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he History Bureau officials debated whether or not, in compiling the *Ming History*, to follow the *Song History* model to establish a section of “Biographies of Scholars of the Learning the Way” in the *Ming History*, and whether or not to include Wang Yangming in the section. In the end, the officials ignored Wang’s concrete influence on Ming leaning. Instead, they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cultivating the upright and distancing heresy” and placed Wang Yangming in the “Biographie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Later, because of the Kangxi Emperor’s revisions, this assessment was reversed. In examining this process of debating and determining the “causes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it is clear that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Ming History* was intended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base on the facts, to distinguish what is right or wrong, and to construct a persuasive discourse. And yet they perpetuated the contentiousness inherited from the late Ming and were unable to unify the views of the day, which merely perpetuated factional habits. Nevertheless, the Qing court’s recruitment successfully drew together the scholars of the realm into the Ming History Bureau and silenced the clamor at the margins. This and the subsequent literary inquisition firmly established the court’s authority ov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vanquished dynasty.

Keywords: Erudite Scholasticus Recruitment Examination, *Ming History*, *Diary of the Hall of the Three Fish*, taboo words, vanquished dynasty